

新世纪家庭文学的代际叙事

汪雨萌

内容提要 计划生育国策长久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生育状况与生育理念,也导致了传统家庭结构与秩序的翻覆变化。新的代际关系在经历了十余年的重构之后,在新世纪的家庭叙事中终于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抚养关系变得更为密切,父辈沉重的爱意甚至将子女压迫到窒息;而赡养关系却显得空前冷漠,成年后的子女与父母之间常常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而在此代际关系悖论中的隐含逻辑,实际上是父母与子女在精神上、命运上的同构。他们彼此间是极为相似的,也终身挣扎于摆脱这种相似,这便是新世纪家庭文学中代际叙事的重要主题。

关键词 家庭文学 代际叙事 计划生育 《亲密关系的变革》

汪雨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师 200444

以父母为中心,以家族、宗族为中心,可说是百年中国新文学在看待家庭关系时的不变原则。但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这一原则似乎悄无声息地土崩瓦解。由于生育政策的紧缩,生育意愿的降低,生育成本的增加,使得一个家族的子息繁衍愈加艰难,生育、养育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成为生活的重心。正如阎云翔所言,当代中国家庭生活的主题,已经从对祖先的崇拜,转向对后代的哺育^[1]。黄润龙在《中国独生子女:数量、结构及风险》中也提到:“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人数最少、家庭关系最简单,结构最单一,它不同于以往的‘四代同堂,其乐融融’的联合大家庭,其重心已由过去的老年人(长辈)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亲子关系成为联系家庭、夫妻关系最重要的链接点,孩子成为父母生活、工作围绕的焦点,是‘家庭的中心’。”^[2]家庭的奋斗,财富的积累,个人地位的上升,都与孩子息息相关,父母乃至祖父母为了后代的幸福生活拼尽全力。不难发现,作家们对家庭的关注点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转移到下一代的身上。相比较上个世纪初出走式的代际批判,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体制对代际关系的彻底消解,还有八十年代对西方代际关系的引进和模仿等等,新世纪家庭文学在代际问题上又面临着新的问

[1]参见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

[2]黄润龙:《中国独生子女:数量、结构及风险》,《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题。“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在独生子女成为普遍现象的时代里,抚养成本并没有降低,反而大大升高,在这提高的额度中,心理成本又占了很大比重。父母呕心沥血,苦口婆心,但孩子却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长和发展,又没有其他的子女分担父母的期待;而子女长期处在父母的期盼与疼爱的高压之下,无法顺利地表达和实现个人意愿,父母与孩子之间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交流与理解。独生子女的父母所面临的失落感与挫败感,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而子女所进行的挣扎与反抗,也因为父母唯一的孩子而变得愈发艰难和无力。相比较如何抚养与支持下一代,如何供养上一代,代际之间前所未有的情感与伦理大撕裂,应该是这个时期代际主题所着重探讨的问题。

奉献与缺位:父母与子女的冲突形象

首先,父母一生的操劳全部奉献给孩子,将哺育下一代作为自己生命的最高职责,无论是从道德与责任上,还是从情感上,孩子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一切。父母只有将自己认为最好的都捧到孩子面前,才能感到自己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哪怕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父母的付出也不会停止。诚然,一对称职的中国父母,本就“处在一种特定的道德压力之下”^[1],他们的职责推动着他们完成作为“父母”这一角色所应当承担的任务。这种呕心沥血到失去自我的程度,在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书写上都是罕见的。

在李约热的《一团金子》中,刘成国与胡秀云的儿子刘远将女友失手打成重伤,父母二人当即借高利贷、甚至买六合彩,出钱治疗女孩,即使自己家被催债人搬空也在所不惜。但奇异的是,催债人听过他们借款的缘由后,不仅将拉走的家具给他们还回来,更有的债主替他们扛下了债务,不要他们偿还。在“父债子偿,子债父偿”的传统中国经济文化下,出现这样的债务结局,不能不说是当下新亲子关系的影响,为子女借款而无法偿还的父母是可以被理解的,甚至是被同情和原谅的。戴来的《茄子》中,老孙盘下了一家彩扩店,但“这家店是给儿子小龙盘的,那小子眼看着都二十七了,一直都没个正经工作”^[2]。然而即使店是儿子的,实际的经营者仍然是老孙。葛水平的《连翘》中,为了筹集给寻军上学的费用,母亲不顾危险上山采摘连翘以期增加收入,最终为了能够多摘一丛而被山雷劈死。王祥夫《上边》中的刘栓柱从小去山下读书便是母亲背上背下,背不动也守在村口目送。如今刘栓柱虽然已经在城里工作,父亲却一直守着一亩三分地,每次回家便要他背走一大袋的新鲜玉米。鬼子《瓦城上空的麦田》中,父亲即使捡垃圾,也要将自己和儿子留在瓦城,而且要“活到我在瓦城买下房子的那一天”^[3]。韩少功的《怒目金刚》中吴玉和为了养活妻儿,并给被重度烧伤的儿子植皮手术,卖血、盗墓、倒卖林木,可以说用上了自己所有可能的方法,最终过劳而死。

不论父母能力如何,为子女奉献一切的精神是一样的。在鲁敏的《小流放》中,这种付出甚至带有一种表演的意味。穆先生一家原本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妻子一周要捋饬许多套衣服,还要配上相应的鞋和包,而穆先生的兴趣在领带与眼镜架上,儿子则是数码产品,总之并不缺钱,富裕而时尚。然而他们为了儿子初三一年能够离学校近一点,节省上下学的时间用来复习,他们租住了学校附近的“老破小”,并扎扎实实地过起了苦行僧一般的生活,“钟点工辞了,晚报不订了,网络和有线都掐了,甚至把电视机像棉花胎似的塞到柜子里。原来家养的两只龟、一缸锦鲤以及君子兰什么的,通通寄放到朋友家。妻子的打扮也粗服简装,倒退二十年。”^[4]将家庭生活缩减为只有吃喝、洗漱、睡觉。俗

[1] 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2] 《2003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97页。

[3] 《2002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260页。

[4] 鲁敏:《小流放》,〔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

话说“生儿一百岁，长忧九十九”，这似乎证明着新世纪的父母与传统的父母形象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仔细推敲我们就会发现，新世纪家庭叙事中的父母形象远比传统单一而投入，一旦为人父母，人生就再也没有其他的追求，自身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孩子。

在这些作品表现父母所付出的辛劳，以至于失去了自我本身的价值时，作品中的孩子，尤其是未成年孩子的形象却是模糊的，他们基本没有回应甚至是缺失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家更想表现的，可能是父母的一厢情愿，并以此角度展现当下亲子关系天平的失衡，以及在这巨大的物质付出中所隐含的代际隔膜。

叶辛的《世间问情》中，索远与麻丽同居，固然是情感与欲望有需求，但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同居生活成本较低，可以给留守在家乡的孩子更多的钱，支付他们学习与生活的费用。但女儿索想出现的频率并不高，麻丽的儿子更是只在父母的对话中出现。须一瓜的《义薄云天》中，萧蔷薇与见义勇为的管小健结婚，并非是对其勇敢正义的行为有所感动，而是为了孩子能够在中考中利用继父管小健的见义勇为称号加上二十分，然而这个受益者却是缺位的，须一瓜没有给这个孩子一秒镜头。杜光辉《洗车场》中的洗车工刘狗顺，通过这样的零工凑足了儿子重点大学研究生的学费。他原本自豪而充满希望，但最终却因为自己缺乏“关系”，不能给儿子更高的发展平台和人脉资源而变得心灰意冷，自怨自艾，但这个儿子，却从头到尾没有在作品中出现。余一鸣《种桃种李种春风》中的单身母亲大风为了儿子清华能够进入城里的重点小学，在村中忍气吞声，终于走通了村里出身的重点小学小梁老师的路子。为了让清华进入重点初中，她先去分管教育的退休陈书记家中做保姆，忍受老陈书记时不时轻微的性骚扰，又与一中的大厨师傅、特级教师进行性交易，甚至赌上全部积蓄通过黑中介购买入学名额，可说是将自己仅有的可怜资源发挥到极致。然而在几万字的篇幅中，儿子清华似乎只有一个灯下默默学习的模糊背影。

这样的关系描写也许并非作家们有意为之，但这恰恰反映了新世纪家庭文学代际主题中一种新的关系状态。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用“有毒的父母”来形容这种代际关系：“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不管父母对其子女的影响表现得如何，父母都会是错误的；没有一个父母能觉察到或能完全答应子女的所有需要。然而，有许多父母总是以伤害孩子个人价值感的方式对待子女，这可能导致孩子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要与自己的童年记忆和形象进行斗争。”^[1]这种说法来源于教育学家苏珊·福华德，她认为：“（有毒的父母）倾向于将反抗或个体差异看成人身攻击。他们通过强化子女的依赖性和无助性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不是促进子女健康发展，而是下意识地暗中破坏这种发展；他们经常自以为是在为子女的最大利益而行事。”^[2]在许多新世纪代际文学叙事中，子女的声音似乎是不重要的，他们的生活空间与精神空间都被父母的付出与期待挤压；他们享受着父母沉重的付出，但也同样背负着父母沉重的期待。他们要读书改变命运，要跃出农门成为城市人，他们要在更高更远的地方立足，变得体面、变得富裕，直到让父母成为周围人艳羡的对象。

在传统的家族文学中，我们似乎也常常看到这种子女缺位的叙事结构，但同样被深重的期待所窒息的缺位的子女，背负的往往是光耀门楣、振兴家族这样的宏大使命，但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父母的这种期望，却往往是出自于他们自身因为种种原因而没能完成的人生规划。也就是说，父母的愿景是个人化的，父母的付出也同样是个人化的，他们可能并非失去了自我，而是将未完成的自我转化为完美的超我，并投射到子女的身上。既然培养子女是为了塑造另一个自我，那么子女身影的消失，也就

[1][2][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第137页。

符合逻辑了。卢良江的《狗小的自行车》中,狗小被误认为是富商失踪的儿子,而狗小的父母也默认了这样的误解,并将狗小过继给了富商夫妇。狗小也并不留恋自己的原生家庭,很快就被优越的生活条件所吸引,不再联系自己的亲生父母,他的父母对此也并不怨恨,反而发出了欣慰的感叹:

走回住处的路上,狗小爹欣慰地对老婆说,咱们村里每个人都想成为城里人,就是没有一个成为城里人的,可咱们的狗小现在就是城里人了,他真是一个有福气的孩子呀。

狗小娘应和着说:是呀,咱们狗小真是一个有福气的人。^[1]

“两个自我”:父母与子女的心理同构

想让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即使孩子与自己再无关系也愿意,这可以说是新世纪家庭文学所展现出的亲子关系的一种极端。阎云翔在《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中提出了“父母心”的概念:“‘父母心’意味着父母对孩子无尽的爱与仁慈,这是父母愿意为孩子操劳的最强烈动机。不管孩子如何让他们失望,甚至辜负了他们的爱与关怀,父母仍然十分关心子女的幸福。”^[2]当下家庭文学中的父母,乃至祖父母,已经超越了这种“父母心”,他们指望孩子飞黄腾达,但并不是期望孩子能够给予什么回报,只要孩子能够完成他们的期望,实现了他们的自我,客观上帮助他们完成了自我投射性的付出,他们便感受到无上的满足。毕飞宇的《大雨如注》中,姚子涵的父母只是高校后勤职工,并没有太多文化,但却将女儿培养成了气质佳、成绩好、多才多艺的“别人家的孩子”。然而姚子涵却并不满足,她像狗小一样,并不感激自己父母的付出,反而觉得父母是拖累,至少是不能给自己提供更多资源的无能之辈,因此在她大病醒来之后,成为了一个满口英语的外国人,她的潜意识从语言开始,摒弃自己的出身。葛亮的《阿霞》中,阿霞的父亲为了支付儿子的学费,孤身一人来城里打工,甚至患有轻微精神疾病的姐姐也来餐馆工作,然而弟弟似乎对父女俩的牺牲与付出毫无知觉,只怨恨他们不但没有路子给自己找关系,找工作,还要成为自己的拖累。但作品的最后,姐姐仍然对“我”说,她为弟弟能在南京城里找到工作感到欣慰和骄傲。东西的《篡改的命》中汪长尺为了能让儿子大志顺理成章成为城里人,更是亲手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自己的仇人,自己则跳江自杀。而汪长尺的父亲汪槐对城里人也有执念,在汪长尺的骨灰被送回乡里时,他甚至作法阻挡汪长尺的灵魂,让他去城里投胎。一代代人为了子孙能够成为城里人而奋斗,这固然是为了子孙的幸福着想,但还有一重根源是在于自己进城的愿望一直求而不得。令人惊讶的是,在这几部作品中,相比起悲伤和愤懑,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无奈的宽容和欣慰。这正是因为孩子已经成为另一个自我,父母已经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满足,所以即使孩子甚至要斩断与家族的亲缘关系,也在所不惜。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年后,生育数量的减少与不断收缩的后代规模使得中国父母越来越处在一种“输不起”的状态,没有更多的机会试错,子女成才像是孤注一掷的赌局。而父母个人色彩强烈的抚育方式,也往往会激起子女的反弹。在社会新闻上,我们常常看见对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孩子,尤其是独生子女往往会被称为“小皇帝”“小公主”,以说明他们在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所受到的无微不至的呵护。但同时必须看到,在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关注与呵护下,这一代孩子恰恰是没有个人自由的,他们被沉重的家庭之爱、代际之爱所裹挟,从而也被固定在了“孩子”的位置上无法长大,也无法拥有自己的意志。因此他们最渴望的,可能是不再被家庭职责与家庭角色所束缚,成为一个仅仅凭借出生权就可以拥有自主性的个体。但这种对个性与自由的渴望,是否也是他们曾经生活在高度集体

[1]《2004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49页。

[2]阎云翔:《中国社会的个体化》,陆洋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7-198页。

化社会的父母自身愿景的投射?可惜的是,因为长期被代劳的爱所包裹,他们内心对父母产生的依赖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深刻,甚至不能在人格和精神上产生完整的自我。

在“80后”的一些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端倪。张怡微的《蕉鹿记》中这样描写母女间微妙的关系:“那些要紧的事,她也不太烦我。我们彼此尊重得像外国人一样。我甚至怕下一次见到她时,她会踮起脚在我脸颊亲吻一下。我怕母亲孤单,就提出搬去和母亲一起住。母亲没有反对。其实是我比较需要她,哪怕她未必是我最想日夜相处的人。”^[1]而在她的《度桥》中,母亲对已经经历过结婚离婚的成年儿子的态度,事无巨细的交代,仿佛他是个无法自理的孩子:

她是个好母亲,手把手教我许多生活技能。尤其是我过了三十岁以后,她更加勤力地训练我择菜、洗衣服、清洁马桶、整理家务。有个大冬天,她特地买了荠菜摊在桌上叫我拣选,她则在一边幸灾乐祸地刷股票。我拣得死去活来,腿酸手凉,母亲就笑嘻嘻地说:“当妈不容易吧,以后可要长脑子,大冬天千万别买这种菜,去了黄叶吧,还要择头,择了头还有泥沙,冲泥沙的时候也不能用热水。妈妈看你这辈子也请不起保姆了,往后等妈妈死了,你一个人傻不溜秋天寒地冻买了难择的菜,越择越冷,越冷越想我……”^[2]

两个残缺的自我构成了新的代际冲突。对下一代来说,程度轻一些的会显现出与传统的“孝顺”所不一样的态度,不耐、烦躁、嘶吼,这是我们对这种冲突最先的印象。在《王祥夫》的《上边》中,刘栓柱在为家里修葺房屋时,不断拒绝自己母亲对自己的关怀,不喝母亲递来的水,不用母亲递来的手绢擦汗,他以一种麻利而忙碌的姿态来展现自己的能力。但母亲却看不见,她仍在回忆刘栓柱的童年,并将眼前的大汉与那个牙牙学语的孩童重合起来,最终她给予栓柱的,是给予一个孩童关心的方式。在朱山坡的《灵魂课》中,阙小安面对母亲的唠叨,面对母亲让他回到故乡找回灵魂的苦苦劝说没有丝毫理解,他只觉得母亲精神有问题,给他丢人,常常在人前对母亲面露愠色,大声呵斥。在东西的《猜到尽头》中,招玉婷怀疑铁流在外工作时有外遇,彻夜不归家,在一次铁流宣称他回家的夜晚之后,招玉婷反复逼问他们的孩子铁泉,爸爸究竟有没有回家。孩子无所适从,熟睡的他并不知道父亲是否归来,但他却准确地从父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感受到了正确的答案:爸爸回家了。然而母亲并不相信,仍然深陷丈夫出轨的思维定势中无法自拔,而父亲却在反复向他确认自己回家的细节以期证明自己的清白。在不被信任、不被理解、充满恐惧的感受中,铁泉终于发出怒吼,表示他再也不会“知道”父母的事情,将父母对他心理的压迫和控制拒之门外。

这种反抗也会层层升级,并达到父母也失去掌控的地步。在很多作品中,亲子之间已经完全隔膜。随着科技与网络的发达,孩子对世界的掌握只要通过电脑、手机就可以完成,父代与子代之间经验与知识的传承早已不重要,因此孩子对父辈的依赖与信任也随之瓦解,甚至掌握了最新科技的青少年可以反过来批评与教育,甚至是领导长辈。叛逆、漠视……种种“少年问题”也在新千年代际主题中深刻地凸显出来。东紫的《白猫》便是典型的一例。男主人公离异后,儿子跟着前妻生活,长久不生活在一起,使得“我”对儿子的生活一无所知,甚至买了日记本想要记录下每周和儿子的短暂相处都变得非常矫情。这并不是因为父亲的不尽责,而是长大了的儿子只将背影留给父亲,面前永远是点亮的电脑屏幕和噼啪作响的键盘。他拒绝与父亲说话,也没有与父亲沟通感情的欲望,对父亲声情并茂回忆他幼时趣事的模样,他只觉得尴尬与无趣。“我”为了能够博得儿子的一个笑脸,不惜将自己最讨厌的猫带回家喂养,然而这样的举动也没有能持续挽回儿子的情感,“我”只能在黑夜中与猫咪共享自己对儿子的爱。小说的最后,“我”惊悟“竟然从未想到应该教会儿子去传承爱,我竟然从未想过应该为儿

[1][2]张怡微:《樱桃青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第25页。

子当一个把爱坚持下去的榜样”^[1]，我们认为这姑且算作作家的一种景愿，毕竟作为孩子，他们早已不需要，也不期待父辈的传承。

更有甚者，孩子为了逃离父母对自己命运的预设，不惜以毁灭自己为代价，一方面仿佛只有将自己的肉身与灵魂完全消灭，才能摆脱父母的影响与控制；另一方面，网络的无处不在让他们更无法从现实与虚拟，从父母的期望形象与子女的自我定义的撕裂与隔绝中摆脱。艾伟的《游戏房》中，老徐靠着自己的修车摊供儿子上学，一直认为儿子是一个木讷的老实孩子，但直到警察因为打架斗殴逮捕了儿子，才知道儿子早已脱出了自己所能教育的范围。但在儿子看来，老徐一辈子窝囊无能，他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自给自足，但老徐在他心中早已经失去了作为父亲的权威，他虽然对自己的前途还很迷惘，但“绝不成为父亲那样的人”^[2]却如同座右铭一般深刻而坚定。然而正是这一座右铭，让他最终杀了人。余一鸣的《愤怒的小鸟》则更为超现实。小学生金圣木不仅扎根于虚幻的游戏世界，并且在游戏世界中成为了一呼百应的王者，并且领导了在成人中身份地位都很高的官员。在他的父母还在削尖脑袋研究他的奥数题时，他已经深陷在虚拟的世界中，享受着虚拟的能量和权力。金圣木和他的父母已经完全生活在互不交集的平行世界中，当他回到现实中时，他已经无法承受自己近乎赤贫的父母和毫无权力的家庭，并最终毁灭了自己。曹军庆的《云端之上》亦是如此。焦之叶大学毕业后失业在家，将自己锁在房间内闭门不出，在自己的云端之城中呼风唤雨，三妻四妾。父母便每日将饭菜做好，衣服洗好，放在儿子房间的门口，后来更是只能绕出家门，将饭菜放在儿子的窗口，每天能见到的不过是儿子伸出窗外的一只手。他们的付出在儿子这里得不到任何感激与回报，对儿子也一无所知。母亲试着用纸条与儿子沟通，但她雪片般的话语与哀诉却得不到孩子哪怕只言片语的回答，连父母的死也无法将他从虚拟的世界中拉回。

在李浩的《失败之书》中，哥哥喜爱画画，但却被父母责打，认为他不务正业，但哥哥最终还是走进了“艺术村”，成为了一个失败的，一无所有的画家。重新回到父母身边的哥哥对生活、对家庭、对父母充满了恶意，父母战战兢兢地宽慰他，鼓励他，供养他，甚至试图用绘画来唤醒他生活的勇气，但最终都被他以狂暴的方式一一击碎。他的愤怒实际上来源于自己的无能，但是父母却成了他的替罪羊。

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对自己的愤怒和对父母的愤怒在这些作品中其实是同构的。在他们怨恨父母给自己设定了人生轨迹的同时，也深知自己除了这轨迹也别无可能；而父母在对儿女恨铁不成钢的时候，有时也是在对自己失败的人生作悄悄的总结。对失败的恐惧，对成功的渴望，同时裹挟了父母与子女。可以说，父辈与子辈都无法接受自己的平庸，也无法直面平庸的彼此。在这种充满逃离的张力的代际关系中，父母与子女的痛苦与虚弱是相等的，他们的同构是可以互相阐释的，然而他们之间的联系却无法通达。这就给子女成年后更为冷漠与陌生的代际关系埋下了深刻而绝望的伏笔。在新世纪家庭叙事的代际主题中，父母与孩子，仿佛没有修完的巴别塔，拒绝理解，拒绝沟通，他们都只在意自己的苦楚，即便付出再多的爱意，也永远无法抵达。

精神遗弃：成年子女的代际反抗

德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德拉·茹科夫斯基的著作《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关于过去和将来的老人》认为：“在代际交往中的亲密程度不仅是锚定在自身的童年，而且也会向后代传递……而这会在老年阶段发挥作用。”^[3]将自己的一生都投注在儿女身上，将儿女视为家庭的中心，这样单向付出的代际关系

[1][2]《2010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第458页，第491页。

[3][德]亚历山德拉·茹科夫斯基：《家庭中世代间的照顾：关于过去和将来的老人》，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第141页。

已经具有了诡异的传承感。一方面,父母在养育子女时采取不计成本,甚至自我牺牲的方式,子女成年后也会将全部精神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而将父母永久地置于被忽视和遗忘的位置。另一方面,在他们的童年,父母将所有的物质财富都供给他们,却很难做到倾听他们的声音,反过来,他们也拒绝倾听年迈的,或者说返回童年状态的,对生活失去掌握的虚弱的父母。

因此在新世纪家庭文学中所展现的代际关系的新问题之一,便是老年人心理上老无所依的状态。儿女不能从精神上理解父母晚景的孤寂,并产生相应的同情心,他们可以付出金钱或是物质很好地赡养父母,但又将父母隔绝在自己的生活与精神世界之外。戴来的《准备好了吗》便是典型的例子。老万的儿子万一是一名行为艺术家,而老万因为受不了万一离经叛道的行为而决定以跳楼自杀来挽回儿子。而万一在看到楼顶的父亲之后,并没有向老万想象的那样跪地求饶,请求父亲的宽恕,而是也站到了楼顶,要求父亲接受他的职业,不然他就跳下去,只当父亲没有这个儿子。万一在生死对决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父亲再怎么生气,也无法超过失去儿子的痛苦。儿子不想了解父亲的痛苦,他只觉得父亲不理解他,他最终的报复,是将父亲仪式般的以死相逼,解构成了一场行为艺术。

葛亮的《琴瑟》中,外婆行动不便,儿女给她配了轮椅,请了家庭护士,仿佛这样便完成了对她的照顾。但实际上,护士粗枝大叶难以堪用,最终照顾外婆的责任还是落到了同样年迈的外公身上。黄咏梅的《父亲的后视镜》中,子女则一再强调父亲的黄昏恋是遇上了“拆白党”,最终一定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却不愿更进一步去体味并抚慰父亲清冷孤独的晚年。陈丹燕的《雪》也同样展示了两代人生活空间与情感空间的隔绝。女主人公郑玲的父亲病危,公公早逝,母亲与婆母都患有抑郁症。按照传统的代际伦理,郑玲夫妇或他们的兄弟姐妹理应将两位孤独且病弱的母亲接来同住,至少是时时探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孩子们很少去看望他们的母亲,不愿见到她们“知识妇女的抑郁的脸”^[1],不愿听到她们的絮叨和抱怨。如果不是郑玲父亲病危,一家人需要吃最后一顿团圆饭,他们连过年都不会相聚。而在这顿团圆饭中早到了的郑玲,宁可在肯德基中打发时间,也不愿在没有其他家庭成员陪伴的情况下独自面对父母。而他们的孩子似乎也继承了这种清冷的关系,在这最后的一顿团圆饭上,第三代是缺席的。毕飞宇的《虚拟》中,如果我们将祖父与父亲、父亲与“我”拆解为两代亲情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代际间的隔膜甚至带有了遗传和轮回的意味。父亲固然是怨恨祖父的,他是祖父最“失败”的学生,在教育局的工作又因为祖父的一句话而失去了前程,直至退休也只是小小科员,因此他的一生都在和祖父“赌气”,最后也不参与祖父后事的操办,甚至在祖父去世后便立刻改变了家中的陈设格局,象征着将祖父的影响完全摒除。而祖父虽然对父亲并非没有愧疚与歉意,但他宁可在酒醉后将自己的“对不起”吐露给马桶,也不愿直接告诉自己的孩子。这种父子间的隔膜又传递到了父亲与“我”之间。“我”是祖父的骄傲,也因此越过了父亲,与祖父形成了奇特的亲子关系,父亲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退了出去”^[2]。他在空间上退出了与儿子的亲子关系,也从此割断了与“我”亲密的情感联结。衣向东的《过滤的阳光》中以“我”与父亲三个阶段的交流写出了两代人之间从怨恨到理解再到无言以对的心路历程。成年后的儿子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愿意与父亲沟通,但当他带着满腹衷肠回到故乡面对父亲时,发现父亲早已没有了与自己沟通的能力,显出一副“疑惑而呆傻的样子”^[3]。

这些老年人早已失去了对子女的掌握,他们也无力追赶子女所面对的五光十色的世界,那他们是否就应当被遮蔽、被忽略,被如同日本传说中那样,被驱赶上精神上的“老人山”呢?“空巢老人”是当下流行的形容词,在上述作品中,我们已经能够非常具体地描述出这样的—一个群体。从客观上来说,计

[1]《2008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98页。

[2]《2014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3]《2002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2年版,第522页。

划生育政策使得老年人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所能得到的供养和慰藉都会相对减少,子女养老、家庭养老也越来越成为中青年一代无法忽视的重担^[1]。但更重要的是,被物质裹挟的年轻人尚且能够离开巢穴,为了更加完美幸福的自我飞往更加广阔的天地,而老人们却只能守在空门中,独自品味自己慢慢老去的躯体和渐渐混沌、无以交流的精神世界。

更有甚者,“空巢老人”们正在孤独地死去,他们老去的人生已经被人忽视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王祥夫的《真是心乱如麻》中,子女全家移民新西兰,将老母亲一人丢给保姆照顾,并承诺如果将老太太照顾到一百岁,工资便能翻倍。从此子女便很少打电话回来问候,即便来电,也只是问老太太的身体状况,保姆说一句“睡了”,便放心挂了电话。因此在老太太忽然去世之后,保姆仍然住在这座空房子里,而子女每次打电话来,都能得知母亲身体很好,或是出门与老同事聚会,或是正在休息,竟也没有穿帮。可见子女的例行问候,已经空洞虚假到了何等程度。面对父母的老去与死亡,《归来》则采用了更为超现实的方式。吴婆婆的子女常年在外打工,只剩她一人在乡村独自生活,她的日常生活儿女们几乎一无所知,而她与儿女最后的对话是通过通灵的方式完成,也就是所谓的“领牲”。子女通过与领来的羊的对话,追索着吴婆婆在生命最后的牵挂。这种方式无非是给活着的人的某种心理暗示与安慰,最终以“你高兴满意放心就好”^[2]结尾。但吴婆婆真正的内心世界,反而被这虚妄的“领牲”遮蔽。她是如何摔倒,如何去世,一个人又是如何完成对自己生活的安排的?王祥夫在作品中虽然极力营造了一种温暖而感恩的氛围,但却无法掩盖对吴婆婆生前生活的无知与空白。鲁敏的《离歌》中,彭老人虽有儿女,却一直独自居住在村中,能够和他说话的人,只有为葬礼扎纸人的三爷。而彭老人意外去世后,竟三天无人发觉,只有三爷看到彭老人没有按时来修桥,才发现彭老人早已不在人间。似乎很难说这些子女不孝顺,或是没有尽到赡养的义务。他们付出了相当的金钱,在父母死后所表现出的悲伤也是真实可触的,然而父母的处境,却又是那样的可怜而可怕。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在文本中做了大量的留白,但读者却无法在这留白中勾勒出老人们的晚年生活,他们在无法传达的孤独与闭塞中度过余生。在信息发达,人人都在抱怨自己“没有隐私”的时代却常常独自蜷缩在无人知晓的角落,这是怎样的悲哀,令人不寒而栗。显然,作家们已经用自己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模式概括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代际模式。这种模式是可以复制和迁移的,甚至,它们不仅在家庭中纵向传承,而且可以异质同构于其他类型关系中。

父母与子女,本是这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他们的精神世界本该是相通的,是知己知彼,会心而莫逆的。然而在追寻“自我”和关注“自我”的过程中,这种关系异化了。父母将子女看作自己生命的延续,更是自我的另一种可能性,因此处处干预、控制子女本该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而子女则在顺从与反抗、依赖与独立的矛盾中慢慢长大,并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渐渐筑起与父母之间的高墙。无论作品多么热闹、纠缠,冲突如何激烈,如何将人物关系表现得牵肠挂肚,十指连心,但依然无法掩盖这种热烈之下孤独而无助的自我。我们何以成为子女,又何以成为父母?鲁迅早在上个世纪初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但在新世纪,这种最为牢固、最为自然的关系依然需要拷问,特别是新的人口状况给这一关系带来的新的性质不但使历史的旧债无法偿还,又增加了更多负面清单。这正是新世纪以来家庭文学叙事带来的新的问题和新的思考。

〔责任编辑:平 啸〕

[1]参见王树新主编:《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012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